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八十九期
2018年05月　　頁41~75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1805_(89).02

陳傅良《春秋後傳》的解經方法*

康　凱　淋**

摘　要

本文以南宋陳傅良《春秋後傳》為研究對象，從經學史與學術史兩條脈絡，考察是書的解經方法。陳傅良依循呂祖謙詮解《左傳》的研究模式，發揮永嘉學派「通世變」的治學綱領，對春秋史事提出歷史敘述與解釋，並將之作為判斷標準，廓清《春秋》經文書辭的異同，推尋聖筆褒貶與麟經大義。這不僅延續兩漢《公羊》學的解經傳統，也體現永嘉學派經、史兼治的學術特色，較蘇轍、朱熹、呂大圭、黃震等輩更能落實經、史交融的方法。而此動機是不滿程門後學將形上「理欲」扣緊《春秋》的治學理路，因此選擇將形下「世變」融貫《春秋》，以歷史制度和具體事功為導向，矯正漸已淪於虛誕空無的程門學風，並試圖藉此躋身學林，有意躍升為學術之主流。

關鍵詞：陳傅良　春秋　左傳　永嘉

105.11.03 收稿，106.09.22 通過刊登。
* 感謝審查教授惠賜寶貴意見，以及校對人員細心校訂，使本文臻於完備。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Email: 095666@mail.fj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陳傅良，字君舉，號止齋，浙江瑞安人。生於南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卒於寧宗嘉泰三年（1203），歷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他是永嘉學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上承鄭伯熊、薛季宣，下啟葉適，[1]對永嘉學派的貢獻極大。個人的學術生涯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2]隆興元年（1163）始著力舉子業，未滿三十歲就已「文名大震」，[3]聲勢浩蕩，「人相與傳誦，歲從游者常數百人」，[4]講學的盛況連宋光宗都有所耳聞。[5]至乾道二年（1166），陳傅良從薛季宣講經制之學，[6]開始改變學術方向，不再投入場屋試士，轉以成己工夫為重，而且「既登第，後盡焚其舊藁」，[7]後期治學方向逐漸為永嘉學派的學風定調。

依其弟子蔡幼學（1154-1217）所記，陳傅良的著作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讀書譜》一卷、《建隆篇》一卷、《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8]多屬經、史類型

1 元末明初之學者王禕提到永嘉經制之學：「蓋自鄭景望氏、薛士龍氏，以及陳君舉氏、葉正則氏，先後迭起。」見明．王禕，〈王氏迂論序〉，《王忠文公集》，卷 7，《叢書集成初編》第 242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09。

2 此是按照陳傅良弟子曹叔遠所劃分：「（陳傅良）執經戶外，方屢闔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邃於乾道之丁亥。」見宋．曹叔遠，〈止齋先生文集序〉，宋．陳傅良著，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附錄三，頁 704。

3 宋．吳子良，〈陳止齋〉，《荊溪林下偶談》，卷 4，《叢書集成初編》第 324 冊，頁 42。

4 宋．蔡幼學，〈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宋．陳傅良著，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附錄二，頁 690。

5 陳傅良〈吏部員外郎初對箚子〉記載：「上云：『且說話。聞卿在永嘉從學常數百人。』奏：『臣無所長，只與士子課習舉業。過蒙清問，不勝悚懼。』上云：『知卿學問深醖，著書甚多，朕欲一見，可盡進來。』奏：『臣豈敢著書，不過講說舉子所習經義，何足仰塵乙夜之覽。』」見宋．陳傅良著，〈吏部員外郎初對箚子〉，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20，頁 285。

6 宋．吳子良，〈陳止齋〉，《荊溪林下偶談》，卷 4，《叢書集成初編》第 324 冊，頁 42。

7 同上註。

8 宋．蔡幼學，〈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宋．陳傅良著，周夢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畛域，其中《春秋》學的著作就有兩部。樓鑰（1137-1213）稱陳傅良「博極群書，而于《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9]肯定他對《左傳》的研治成果。後代學者如趙汸（1319-1369）也以止齋「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10]孫詒讓（1848-1908）則推舉他「在宋儒說《春秋》書中，為最有根據。」[11]高度評價止齋《春秋》學。

陳傅良認為《左傳》與《春秋》的關係非常緊密，是書採輯諸侯史記，次第序列以發明夫子筆削之指，不能單從編年體的史書性質看待《左傳》；[12]而讀者可以透過《左傳》中所保存《春秋》不書的內容，反推麟經書法用意。[13]止齋《左氏章旨》就是闡發此說，[14]可惜此書已佚，無法盡觀其論。晚年又作《春秋後傳》，據門人周勉所述，此書是止齋生前未竟之作，學生在他過世以後才整理而成，[15]既然《左氏章旨》業已亡佚，那麼《春秋後傳》則成為掌握陳傅

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附錄二，頁 697。

9 宋・樓鑰，〈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攻媿集》，卷 95，《叢書集成初編》第 2019 冊，頁 1328。

10 元・趙汸，〈春秋集傳序〉，《春秋集傳》，《通志堂經解》第 25 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頁 14487。

11 清・孫詒讓著，潘猛補點校，《溫州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5，頁 202。

12 陳傅良〈答薛子長〉曰：「蓋《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無非解剝經誼，而非自為書。」在〈徐得之《左氏國紀》序〉中也提到：「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之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以上分見宋・陳傅良著，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6，頁 468；卷 40，頁 510。

13 陳傅良曰：「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見宋・陳傅良，〈答賈端老〉，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5，頁 455。

14 樓鑰曰：「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旨》一書，首尾專發此意。」趙汸也提到：「陳氏通二《傳》，於《左氏》以其所書證其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目前在《後傳》中還可看到這項方法，但多是以小字的形式附錄於正文之下，而且許多地方會另註「傳例說在《章旨》」，可見這項方法不是全書主軸，二書各有所重，《後傳》另有延伸一套解經方法。見宋・樓鑰，〈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旨序〉，《攻媿集》，卷 51，《叢書集成初編》第 2011 冊，頁 699。元・趙汸，〈左氏傳補注序〉，《春秋左氏傳補注》，《通志堂經解》第 26 冊，頁 14973。

15 周勉曰：「先生為《後傳》，將脫稿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良《春秋》學的重要文本。

目前幾部《春秋》學史都已概述陳傅良《春秋》學的方法與特色，但是各家說法仍有不同。趙伯雄肯定樓鑰序文，並延伸說：「陳氏不認為《春秋》是一種前後體例統一的、固定的標本，不贊成以『例』、『變例』之類的東西說《春秋》，而是主張對《春秋》所歷二百四十二年做歷史的考察，根據『世變』來理解經義。」[16]扼要點明止齋反對以「例」解經，因此援引「世變」為方法。戴維卻從《左氏章旨》推測，認為他「是極重凡例褒貶的，他所使用的推尋方法，較前人為勝」，[17]並指出：「薛季宣、陳傅良師弟也可自成《春秋》學上一個派系。」[18]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則謂《後傳》不計較書例，著重史實的分析排比，總體觀察和朱熹大體相似；「雖然多少受胡安國的影響，嚴夷夏之辨，實則也是對國勢日益衰微的悲憤」。[19]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歸納宋代《春秋》學的演變階段，以南宋前期、中期是「經史交融期」，將陳傅良和呂祖謙、朱熹、李明復等人歸為「事義會通，經史交融」，屬於同一類型的學者，提到：「陳氏的這種治經方法，應該說，也還是具有一點本期《春秋》學『事義匯通、經史交融』的時代特色。」[20]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也把陳傅良、呂祖謙合併為一節，訂立「著眼于《左傳》的文、史」之標題；[21]但孫旭紅《居今與志古：宋代《春秋》學研究》中「經史交融、以史通經」則列舉蘇轍、朱熹、呂大圭、黃震，反而未提及陳傅良或呂祖謙。[22]

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貼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貼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矣。」此外，從止齋書信也可看到他晚年於病榻前著書的辛勞，〈答張端士第二書〉曰：「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啟手足之前，更加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籍手見古人無作。」〈答張端士第四書〉亦記：「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裹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尚欠刪潤，不免就病中勉強。」見宋・陳傅良著，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8，頁 488。

16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頁 546。

17 戴維，《春秋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頁 383。

18 同上註，頁 381。

19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 239-240。

20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 58。

21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頁 234。

22 孫旭紅，《居今與志古：宋代《春秋》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觀察以上各家論點，我們可以拋出幾項問題：（一）學者對陳傅良《春秋》學與凡例褒貶的關係有不同意見，究竟陳傅良如何看待《春秋》凡例褒貶？推尋方法有何更勝前人之處？（二）胡安國和朱熹對南宋《春秋》學的影響很大，各有弟子師友繼承弘揚，陳傅良與他們的異同為何？確實已自成《春秋》學上一個派系？（三）《春秋後傳》是否符合「經史交融」的特色？此方法的定義意指哪些內容？（四）陳傅良既然身為永嘉學派的學術巨擘，詮解《春秋》與永嘉學術的宗旨有無呼應？而且《後傳》又是他晚年「力疾刪潤，尤其畢生精力所萃也」，[23]病中仍傾盡心神寫作，是不是想透過註解《春秋》表達什麼聲音？本文以上述為討論方向，試圖分析陳傅良《春秋後傳》的解經方法。

二、春秋世變的歷史敘述與解釋

李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自序〉曰：「《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末流，則可稽世道之升降；備伯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24]周室東遷，禮教不修、王綱衰頹，諸侯霸統漸興、伯業爭衡，造成中國倫紀廢壞、上陵下替。至春秋末期，華夏諸侯無統，又漸使吳楚乘勢，肆行無忌，交熾於中國。夷狄騷虐正與諸侯離合、伯功興廢為休戚。

顧棟高（1679-1759）說：「看《春秋》眼光須極遠，近者十年、數十年，遠者通二百四十二年。」[25]陳傅良注意《春秋》之終始，常統合相關經文以見春秋史事之變化。《春秋》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僖公與鄭莊公於石門相盟，《後傳》聯繫此年與定公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之經文：「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26]此段引文舉出幾個重點：書法終始、諸侯合散，以及天下無王無伯。

首先，書法「終始」涉及史事的時間性，記錄內容一直與諸侯「合散」有

頁 131-146。

23 清・孫詒讓著，潘猛補點校，《溫州經籍志》，卷 5，頁 203。

24 宋・李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自序〉，《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通志堂經解》第 22 冊，頁 13020。

25 清・顧棟高，〈讀春秋偶筆〉，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33。

26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1，《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1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後傳》多次有此說解，[27]將各自獨立的經文串成連續有本末的事件，重述《春秋》中的歷史敘事。[28]其次，《春秋》隱公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陳傅良曰：

> 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渝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29]

春秋之初，東諸侯相聚為黨，鄭莊公有意聯合諸侯，遂先平魯；齊僖公也欲拉攏魯、宋、衛三國，分別為盟，並以「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30]衡斷這些國家導致春秋從「諸侯無王」走向「諸侯無伯」的局勢。

沈玉成《春秋左傳學史稿》說《春秋後傳》：「全書不斤斤於書例，而是重視對史實的分析、排比，例如把春秋魯國十二公分為三個時期，指出三個時期的特點，從猶知有天子到知霸而不知王，再到蠻夷之侵陵中原。」[31]陳傅良勾勒春秋歷史升降的整體走向：從春秋之初諸侯始不尊周王，淪為伯者相競；再到春秋之末，大夫無君，中國諸侯久無伯者，形成蠻夷爭勢。在歷史敘事之上，還提出諸侯無王無伯的歷史解釋，[32]屬於宏觀式的目光。

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孔子以魯國十二公為《春秋》編年主體，陳傅良又將《春秋》分作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三大階段，敘述每個階段的史事特點，例如「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33]「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

27 例如《春秋》定公十一年：「冬，及鄭平。」陳傅良曰：「《傳》曰：始叛晉也。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見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11，《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213。

28 杜維運說：「所謂歷史敘事，一般來講，是敘述以往發生過的事件。」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225。

29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1，《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128。

30 同上註，卷 12，頁 12216。

31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頁 239-240。

32 杜維運提到：「所謂歷史解釋，大致是闡明歷史發展的軌跡及其意義所在。」又言：「史學家就某一時間與某一空間裏紛紜的歷史事實，將其相互的關係，疏通比較，一旦發現其呈現某種現象或某種意義，而予以指出，則所謂歷史解釋，就幡然出現了。」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頁 226、231。

33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1，《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1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猶止於禮義也」、[34]「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35]或是「莊僖之際，天下知有盟主而已」、[36]「文公而下，諸侯無政，大夫強也」、[37]「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38]相對之下，這是微觀式的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

歷史發展本身是紛繁複雜的，史事會隨著時移世易而形成種種殊相，過程樣貌也會越趨紛繁。陳傅良除了第其本末源流，組織歷史的規律之外，還善於檢尋當中變幅的節奏，[39]所以詮解《春秋》就不止於敘述春秋時期走入南北之勢的面貌，而是積極推尋造成南北分裂的成因。《春秋》宣公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後傳》曰：

> 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於是始，終謹書之也。[40]

楚莊王侵陳之目的在侵宋，十五年後經文書「宋人及楚人平」，楚莊王得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41]故此年楚遂侵宋是一關鍵。而《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諸侯救晉，晉始失伯，不足以主夏盟，促成南北之勢，[42]諸侯遂於襄公二十七年同會于宋，「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43]

---

34 同上註，卷 3，頁 12142。

35 同上註，頁 12144。

36 同上註，卷 6，頁 12169。

37 同上註，卷 9，頁 12195。

38 同上註，卷 10，頁 12210。

39 例如他曾對秦代走向滅亡提出「用民」的癥結：「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強，不能當民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秦始皇守置百姓於邊境以牽制匈奴，未見隱隙之民心，導致秦朝加速覆滅。見宋・陳傅良，〈民論〉，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附錄一，頁 653。

40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7，《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177。

41 同上註，頁 12180。

42 陳傅良曰：「書救晉何？晉遂失伯也。……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會于申而淮夷至，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於越入吳，春秋終焉，蓋於是焉始，故謹而書之也。」同上註，卷 9，頁 12195。

43 同上註，頁 121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蒙文通言：「孟子說：『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史亦然，須從波瀾壯闊處著眼。浩浩長江，波濤萬里，須能把握住它的幾個大轉折處，就能把長江說個大概；讀史也須能把握歷史的變化處，才能把歷史發展說個大概。」[44]歷史興革包羅萬象，若可稽考事件的因果原委，裁擇箇中轉折的樞紐，那麼在紛雜的歷史流域裡也能理出秩序。陳傅良善於「原始察終」，析述春秋局勢如何從諸侯無王走向諸侯無伯，天下又如何分裂成南北二伯，從縱橫經緯的角度勾勒春秋遞變。

樓鑰在〈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中概括陳傅良的解經特點：「深究經旨，詳閱世變。」[45]永嘉學派的治學宗旨就是「通世變」，尤以薛季宣、陳傅良二人最能發揮此說。葉適（1150-1223）就提到：「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46]元儒黃溍（1277-1357）亦言：「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為說。」[47]中國史學傳統已有「通」、「變」的論述，最早在《周易．繫辭》記載：「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更從「通」、「變」揭櫫人類生活的法則：「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48]陳傅良「通世變」的觀點有其淵源，並非新創。

其次，曹器遠稱：「止齋最愛《史記》。」[49]陳傅良肯定司馬遷《史記》的貢獻與價值，[50]曾感嘆「《史記》一書，自班氏莫窺其珍。後學祖班，轉為

44 蒙文通，〈治學雜語〉，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頁 1。

45 宋．樓鑰，〈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旨序〉，《攻媿集》，卷 51，《叢書集成初編》第 2011 冊，頁 699。

46 宋．葉適，〈溫州新修學記〉，《水心文集》，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 10，頁 178。

47 元．黃溍，〈送曹順甫序〉，《黃文獻公集》，卷 5，《叢書集成初編》第 2083 冊，頁 196。

48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繫辭下〉，《周易正義》，卷 8，《十三經注疏》第 1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 167。

49 宋．吳子良，〈賈誼傳贊〉，《荊溪林下偶談》，卷 4，《叢書集成初編》第 324 冊，頁 35。

50 陳傅良曰：「遷卒家學，乃盡□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董仲舒，《尚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蓋其融液九流，萃為一篇，罷黜雜論，自〈五帝紀〉以下盛有依據，荀卿之後，僅見此書爾。」見宋．陳傅良，〈答賈端老〉，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5，頁 4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詆剝，令人扼腕。」[51]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說：「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52]《史記》貫徹這項撰寫原則，嘗試綜其往事，賅括「成敗興壞」之關鍵，即使是制度類的八書，也秉持「略協古今之變」，[53]在盛衰損益的過程點出樞機，[54]將「通」、「變」的觀念實踐於著述，成為重要的史學傳統，[55]而永嘉學派「通世變」之說也是根源於此。

另外，劉塤（1240-1319）曰：「宋乾淳間，浙學興，推東萊呂氏為宗。」[56]呂祖謙是浙東學派共同歸附的領袖，陳傅良曾與呂祖謙交遊。《宋史》本傳記載：「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伯恭友善。」[57]此年陳傅良三十四歲，進入太學學習，「數請間，扣以為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恨見公之晚」，[58]呂祖謙與「陳君舉相聚甚歡」。[59]淳熙四年（1177），呂祖謙於史館纂修《徽宗實錄》，陳傅良亦在朝擔任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兩人互有交流。[60]

51 宋・陳傅良，〈與高炳如監丞〉，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7，頁 475。

52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卷 41，頁 1865。

53 漢・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130，頁 3304。

54 《史記》〈平準書〉提到漢興七十餘年，百姓人給家足，府庫貨財充盈，而「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上自宗室公卿奢靡無度，下有富豪巨黨橫行鄉里，這徵兆導致西漢經濟由盛轉衰。見漢・司馬遷，〈平準書〉，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30，頁 1420。

55 林時民，〈「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傳統〉，《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5 年 12 月），頁 35-58。

56 元・劉塤，〈龍川功名之士〉，《隱居通議》，卷 2，《叢書集成初編》第 212 冊，頁 19。

57 《宋陳文節公傅良年譜》亦記：「六年庚寅，三十四歲，東還過都城，與廣漢張公栻、東萊呂公祖謙友善，秋入太學。」見清・孫葉田，《宋陳文節公傅良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 11。

58 宋・蔡幼學，〈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宋・陳傅良著，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附錄二，頁 690。

59 宋・呂祖謙，〈答潘叔度〉，黃靈庚、吳戰壘主編，《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0，《呂祖謙全集》第 1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頁 489。

60 呂祖謙〈與朱侍講〉：「陳仲舉已到官。近來議論卻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見宋・呂祖謙，〈與朱侍講〉，黃靈庚、吳戰壘主編，《東萊呂太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現查《呂祖謙全集》也有九封東萊先生寫給陳傅良的書信，內容大抵是治學的提點與勉勵。[61]

呂祖謙在〈門人集錄史說〉曾引列子回答壺丘子看史之法：「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對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為看史之法。』」[62]呂氏發明春秋歷史的律則，尤其注意事件變化之鎖鑰，例如《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晉殽之戰，呂氏曰：

> 此一段是大節目。蓋當時天下強國四：晉、楚、齊、秦，互相角立。自殽之役後，齊却與晉為一，秦却與楚為一。雖其間自有曲折不同，然至春秋末，大勢分為二，却自此始。[63]

特別突顯殽之戰在春秋大勢的關鍵，天下一分為二的轉折是始於此役，此役乃變遷之綱領，若套用東萊先生自己的話，春秋大勢的分裂過程是一「統體」，而殽之戰則是「機括」。[64]呂氏「觀變」的模式正可在《春秋後傳》找到雷同的經解軌跡。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說：「呂祖謙習治《左傳》，不管是其閱讀、品評《左傳》時採用的觀史、論史的視角，還是其考索、研究《左傳》時採用的考史、鑑史的維度，都體現出一種鮮明的史學取向。」[65]這的確是呂祖謙的研究特色，他以史有二體，《左傳》是編年體之始，[66]另又將《左

別集》，卷 8，《呂祖謙全集》第 1 冊，頁 421。

61 例如「謹思明辨，最為急務。」或是「近思為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見宋・呂祖謙，〈與陳君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10，《呂祖謙全集》第 1 冊，頁 463。

62 宋・呂祖謙，〈門人集錄史說〉，黃靈庚、吳戰壘主編，《麗澤論說集錄》，卷 8，《呂祖謙全集》第 2 冊，頁 218。

63 宋・呂祖謙著，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左氏傳續說》，卷 6，《呂祖謙全集》第 7 冊，頁 138。

64 呂祖謙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既視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敗，人之所以邪所以正，於幾微萌芽時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見宋・呂祖謙，〈讀史綱目〉，黃靈庚、吳戰壘主編，《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14，《呂祖謙全集》第 1 冊，頁 561。

65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頁 394。

66 宋・呂祖謙，〈門人集錄史說〉，黃靈庚、吳戰壘主編，《麗澤論說集錄》，卷 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傳》和《史》、《漢》並列，談到觀史之方，[67]並述及讀《左傳》之法：「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68]點出讀者宜有整體的歷史規模，看出史事之升降、盛衰、治亂、變遷，如他在〈左氏傳續說綱領〉所言：「看史書事實，須是先識得大綱領處，則其餘細事皆舉。譬如一二百幅公案，但是識得要領處，方見得破決得定，切不可只就小處泥。」[69]宏觀式地泛覽有助於抉發個體事件在群體範疇中的地位，歷史軌跡也會持續性地延展，不會形成零星片段的單一情境；而「學問之道當觀其會通」，[70]看史事應將目光拉遠，擁有廣闊視野才足以會通。陳傅良鉤稽春秋從無王到無伯的盛衰本末，讀法就與呂祖謙相同。

誠如上述，史事的流衍縱橫交錯、千絲萬縷，在宏觀的時間向度上應配合微觀視角，將歷史走勢提攝為幾個獨立單位，呈顯當中的發端與結案，再統合成整體脈絡，遠近相映，避免掛一漏萬。呂祖謙認為讀《左傳》「須分三節看，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71]因此將《左傳》三十卷畫為三節：第一卷開始到第三卷莊公九年齊桓公初起時、莊公九年到定公四年召陵之盟、召陵之盟至卷末又是一節，而霸主迭興則是貫串三節的支線。[72]陳傅良不僅在經解時也將《春秋》分為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三大階段，當他指導賈端老治學時同樣主張：「《左傳》且熟讀，見得隱桓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則成書舉矣。」[73]由春秋歷史的分合，反覆開陳霸統興衰的時勢，透過歷史敘述與解釋以紀春秋伯業興

《呂祖謙全集》第 2 冊，頁 218。

67 呂祖謙曰：「學者觀史各有詳略，如《左傳》、《史記》、《前漢》三書皆當精熟細看，反覆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見宋・呂祖謙，〈左氏傳續說綱領〉，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左氏傳續說》，《呂祖謙全集》第 7 冊，頁 1。

68 宋・呂祖謙，〈看左氏規模〉，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左氏傳說》，《呂祖謙全集》第 7 冊，頁 1。

69 宋・呂祖謙，〈左氏傳續說綱領〉，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左氏傳續說》，《呂祖謙全集》第 7 冊，頁 2。

70 清・王鳴盛，〈唐以前音學諸書〉，黃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卷 82，頁 724。

71 宋・呂祖謙，〈齊小白入于齊〉，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左氏傳說》，卷 2，《呂祖謙全集》第 7 冊，頁 14。

72 宋・呂祖謙，〈左氏傳續說綱領〉，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左氏傳續說》，《呂祖謙全集》第 7 冊，頁 2。

73 宋・陳傅良，〈答賈端老〉，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5，頁 4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廢、強弱并吞的世運遷流，與呂東萊背後的解讀思維是一致的。換言之，止齋治經總綱「通世變」雖然淵源於史遷，但在處理《春秋》經傳的細則中，呂祖謙的影響卻更為顯著。

三、「經史交融、以史通經」解經方法的省思

杜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74]《春秋》經的原型是魯史《春秋》，由「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75]因為兼具經、史兩種不同的特性，所以除了發展成經學註疏的詮釋系統，還作為後代史書之濫觴，[76]各自體現經、史兩方的義法內容。

孫旭紅《居今與志古：宋代《春秋》學研究》提到宋代蘇轍、朱熹、呂大圭、黃震屬於「經史交融、以史通經」的解經方法，並述及此方法的特徵：

> 以史通經之法並非是有一褒貶、義例之說在先，再以事例證成其說，而是將《春秋》所關注的事理、事勢、世變等作為理解經義的基礎。因此，以史通經並非是以史學研究代替經學思考，而是基於經、史各自的特性，在兩者間尋找一條可以共通、共融進而可以相互啟發的渠道。[77]

觀點有其見地，但若仔細分析文本援引的事例，似有必要進一步補述「經史融合與以史通經」的定義。

在談論此定義之前，我們先看陳傅良《春秋後傳》中的內文。《春秋》昭公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據《左傳》記載，此年齊、燕媾和，陳傅良曰：

---

74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1，《十三經注疏》第 6 冊，頁 6、10。

75 同上註，頁 11。

76 章學誠曰：「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見清・章學誠，〈方志立三書議〉，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頁 827-828。

77 孫旭紅，《居今與志古：宋代《春秋》學研究》，頁 1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大故而後書。……靈公以來，齊首敗伯主之約納晉欒盈，叛人也；納北燕伯，猶庶幾乎天下之大義而卒與之平，是黨亂臣逆子也。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圍齊、襲莒、暨齊平、盟于毓、次于五氏，皆特筆也。[78]

自齊靈公之後，齊國國君多行不義。齊莊公於襄公二十一年與魯、晉、宋、衛、鄭、曹、莒、邾會于商任，禁錮欒盈，但隔年秋天卻背約失信，接納欒盈。而昭公三年，燕簡公多嬖寵，燕國大夫聯合殺其外嬖，簡公因而奔齊，齊景公遂於昭公六年伐北燕，護送簡公回國，與之媾和。陳傅良批評齊國自靈公以來納叛人逆子，直與其為黨，經文書「平」正與天下大故相關；襄、昭、定、哀時期的經文如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公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毓」、定公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等皆是聖人「特筆」，藉此罪齊。

《春秋後傳》中的「特筆」亦稱「特書」，是《春秋》之變文，[79]寓有褒貶。陳傅良主張「《春秋》以一字為褒貶」，[80]「《春秋》之有日例也」，[81]而褒貶之法則與他將《春秋》分作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三大階段有關，意從春秋歷史之世變建構《春秋》麟經之大義。所以在春秋晚期，陳傅良以「襄昭定哀之際，唯齊多特筆焉」，[82]至於春秋之初，鄭莊公身為卿士卻糾合諸侯，有志於叛王，因此「夫子之作《春秋》於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焉」，[83]將「歷史解釋」結合「一字褒貶」，不同的歷史階段各有所重。

回頭查看孫旭紅援引蘇轍、朱熹、呂大圭、黃震等人的經解，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學者仍是從「歷史敘事」或「歷史解釋」的角度詮解《春秋》，例如他載錄了蘇轍《春秋集解》對《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侵蔡伐楚」的觀點，並肯定蘇轍能力矯孫復解經之弊，[84]但實際上蘇轍此則說解並未涉及褒貶，若與

78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10，《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202。

79 陳傅良曰：「至於變文則特書也。」同上註，卷 1，頁 12126。

80 同上註，卷 5，頁 12163。

81 同上註，卷 2，頁 12135。

82 同上註，卷 1，頁 12126。

83 同上註。

84 孫旭紅說：「孫復解此條經文完全從夷狄侵略『中國』的角度著眼，罔顧史實，徑以己意說經。蘇轍則力矯此弊，鋪敘《左傳》中關於僖公二、三、四年的史實，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文書法有關也僅見於：「諸侯之師，實為楚動，而《春秋》書其迹，先侵蔡而後伐楚」，[85]從歷史解釋說明書法次序。

孫氏也引了呂大圭「世變」的立論，認為呂氏所說的「世變」是具體展開朱熹「事理、事情、事勢」的主張，欲透過此主張來理解史實，進一步通向「明分義，正名實，著幾微」之大旨。[86]呂大圭論及「世變」的內容的確與陳傅良相同，[87]但箇中最大的差異是：兩方選擇了不同的研究路徑。朱熹認為讀《春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88]關注《春秋》本身的史書性質，「只如看史樣看」，[89]反對一字褒貶。[90]呂大圭認為《春秋》是紀實之書，魯史所有則聖人因之，未嘗有一毫私意強補增添，孔子只是負責刪汰去蕪，將舊史中「情理失實」、「猥冗不綱」的內容剔除，留下得事之實與是非之理。[91]因此「《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92]名稱爵號都是舊史既有，「《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也」。[93]朱子等人高度看重孔子《春秋》對魯《春秋》的依存性，以聖人不會刻意改造魯史、補葺舊文，而是採取據事直書的表達方式，不虛美、不隱惡，行文當下善惡自見，孔子《春秋》仍寓有史家筆法在內，反

『二年，楚人侵鄭』至『蔡曰侵，楚曰伐』，據事實而裁判是非，確定褒貶。」見孫旭紅，《居今與志古：宋代《春秋》學研究》，頁 134。

85 宋．蘇轍，《春秋集解》，卷 5，《叢書集成初編》第 3639 冊，頁 45。

86 孫旭紅，《居今與志古：宋代《春秋》學研究》，頁 145。

87 呂大圭曰：「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見宋．呂大圭，《春秋五論》，《通志堂經解》第 23 冊，頁 13505。

88 宋．朱熹，〈孟子．滕文公上〉，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55，《朱子全書》第 1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頁 1804。

89 宋．朱熹，〈春秋．綱領〉，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朱子全書》第 17 冊，頁 2836。

90 朱熹曰：「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同上註，頁 2833。

91 詳見宋．呂大圭，〈《春秋》褒貶論〉，《春秋或問》，卷 1，《通志堂經解》第 23 冊，頁 13327-13328。

92 宋．呂大圭，《春秋五論》，《通志堂經解》第 23 冊，頁 13502。

93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以一字為褒貶。[94]

但陳傅良明確判斷《春秋》是經，是孔子筆削史書而成：「孔氏之述六經也，則以萬世之史筆削之焉爾。……史行於天下，六經修于聖人。」[95]因此「《春秋》之修辭謹矣」，[96]此「修辭」不僅是前文說的「特筆」，也是筆削之成效，包括史料取捨、歷史建設與歷史批評三元素，[97]攸關褒貶。《春秋》經文並無整齊劃一的書法用辭，事同文異或文同義異的情況不少，也正因為「《春秋》無達辭」，[98]所以歷來儒者多圍繞於此，試圖從「同辭」、「異辭」之間求得聖人之志。[99]陳傅良也發現《春秋》異辭，所以將《春秋》分為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三大階段，提出各有特筆之書法，頗近於《公羊傳》三世異辭：「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100]漢代董仲舒有更具體的論述，以孔子生活的年代遠近與親情厚薄，辨析《春秋》經文之詳略。[101]陳傅良雖然沒有發揮《公羊》張三世的系統，但都注意到經文異辭的問題，而且畫分為三

94 黃震在《黃氏日抄》「褒貶」之下援引鄭樵語：「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不過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自見。」亦極力反對《春秋》有褒貶凡例。見宋．黃震，《黃氏日鈔》，卷 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107。

95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10，《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201。

96 同上註，卷 2，頁 12133。

97 余英時比較章學誠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分析章學誠提到《春秋》筆削之義，正符合柯靈烏所說的史料取捨、歷史建設與歷史批評三者。見余英時，〈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頁 188-191。

98 清．蘇輿，〈精華〉，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3，頁 95。

99 孔廣森（1751-1786）曰：「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見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崔冠華校點，《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281。

100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十三經注疏》第 7 冊，頁 17。

101 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見清．蘇輿，〈楚莊王〉，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1，頁 9-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階段，探察用語輕重，[102]不僅將「世變」運用在歷史敘述與解釋，還橫跨經文書辭的一字褒貶，與呂大圭純粹將世變作為「研事之實」的用意截然不同。

另外，皮錫瑞曰：「《春秋》一字之褒，一字之貶，兩漢諸儒及晉范甯皆明言之。」[103]早在《公羊傳》就有褒貶之語，[104]董仲舒也以孔子「刺惡譏微」、「進善誅惡」，[105]司馬遷亦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106]其他非《公羊》學派的學者也多主張此說，[107]而褒貶方法多體現在時月日例及名氏稱謂之上。[108]陳傅良延續兩漢以來的經學傳統，尋繹《春秋》異辭和褒貶與奪的關係，抬高孔子《春秋》經的主體性，突顯聖人

102 孫詒讓已看出止齋此特點：「（陳傅良）又謂《春秋》褒貶天下之君大夫，託魯以寓王法，莫備於隱、桓、莊之世。及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諸義，並與董子《繁露》『《春秋》分十二公為三等』，何氏《公羊解詁》『張三世』諸例相近。」見清．孫詒讓著，潘猛補點校，《溫州經籍志》，卷 5，頁 201-202。

103 清．皮錫瑞，〈論春秋一字褒貶不得指為闕文〉，《經學通論》（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頁 76。

104 例如隱公元年論經文「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昭公元年：「《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然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十三經注疏》第 7 冊，頁 12；卷 22，頁 273-274。

105 清．蘇輿，〈王道〉，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4，頁 109。

106 漢．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130，頁 3299。

107 例如范甯提到一字褒貶的權威性：「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劉勰亦言：「《春秋》一字以褒貶。」至於關注《春秋》史書性質的劉知幾、朱熹也都承認《春秋》有褒貶，劉知幾曰：「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為前修之楷式也。」朱熹曰：「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監矣。」見晉．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注疏序〉，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 7 冊，頁 5。梁．劉勰，〈徵聖〉，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卷 1，頁 16。唐．劉知幾，〈稱謂〉，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卷 4，頁 106。宋．朱熹著，〈溫公疑孟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3，《朱子全書》第 24 冊，頁 3518。

108 阮芝生說：「《春秋》之褒貶，辭有輕重，義有深淺，然則其褒貶於何見之乎？曰於其或筆或削、或詳或略見之，而以時月日例及名氏稱謂例為最。」見阮芝生著，趙林校訂，《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頁 182-1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筆法的地位。〈叔孫通論〉曰：「夫子作《春秋》，削人之爵、去人之氏、絕人之族，甚嚴也。」[109]孔子《春秋》既已別於魯《春秋》的史家筆法，在善善惡惡價值判斷上，還蘊含更豐富的義理。「特筆」包含經文中諸侯書爵、書名、書字等稱號，不但寓有褒貶之義法，[110]這褒貶義法在《春秋》隱桓莊之世還最為完備。[111]

《春秋》莊公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陳傅良曰：

> 此公孫無知也，其曰無知何？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弒君者連稱、管至父，則其專罪無知何？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春秋》誅利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弒齊襄，無知與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為逆首；公子棄疾實弒楚靈，比與聞故者也，而比受之則比為逆首。苟以為利，則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國，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此《孟子》所以深探其本而遏亂原也。[112]

先將經文書「無知」之筆法納於隱桓莊之世討論，進而表明《春秋》誅利心，故專罪無知，呼應《孟子》深探其本、遏止亂原之義。反觀蘇轍《春秋集解》：「不稱公孫，將為君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113]以齊襄公無道見弒，「公孫」稱法未有褒貶。黃震《黃氏日鈔》僅節錄《左傳》，說明弒者作亂之因。呂大圭《春秋或問》和陳傅良意見相近，亦說明手弒者乃連稱、管至父，但無

109 宋．不著編人，《十先生奧論註》，後集，卷 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2 冊，頁 172。

110 即使呂大圭和陳傅良一樣提到「特筆」，但兩者實立足於相異的基礎。呂氏曰：「一因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當中僅有示義示戒的內容，不涉及褒貶。見宋．呂大圭，《春秋五論》，《通志堂經解》第 23 冊，頁 13504。

111 陳傅良曰：「《春秋》褒貶天下之君大夫，而托魯以寓王法，莫備于隱桓莊之世。是故諸侯有絀其爵者，有雖爵而名之者，有字之者，甚貶之者稱人；於大夫有絀其族者，有雖族但名之者，有字之者，甚予之者稱子，齊、晉伯而褒貶在桓、文矣。」見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3，《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145。

112 同上註，頁 12142。

113 宋．蘇轍，《春秋集解》，卷 3，《叢書集成初編》第 3639 冊，頁 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知與聞此事，故經文書無知弒君，視其為逆首，[114]但也未從稱號裁斷褒貶。

又如《春秋》僖公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陳傅良《後傳》曰：

> 此齊侯也，其稱齊人何？貶也。東遷之初，諸侯始放，《春秋》之治在諸侯而大夫不與。北杏之後，盟主始專，《春秋》之治在盟主而諸侯不與。治在諸侯，貶人之，是故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戰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貶人之，是故於陘伐稱君，於執濤塗稱人，於溫會稱君，於執衛侯稱人。[115]

以莊公十三年北杏之會為界線，從諸侯放恣到盟主始專，聖人各有治法，透過經文書「人」貶之，由名號書辭彰顯仲尼褒貶。而蘇轍先敘述《左傳》載事，末段則云：「書曰『齊人執轅濤塗』，執有罪也。」[116]黃震《黃氏日鈔》解釋齊桓公執轅濤塗之因，[117]呂大圭曰：「稱人，略辭也；稱侯，重辭也。稱人者，其文之常也；稱侯者，持變其文也。《春秋》諸侯之執人也，皆以其私耳，故皆稱人。」將稱「人」視為常例，以「人者，通上下之辭」而已，並辨析陳轅濤塗無罪，齊桓公不應執之。[118]

所以比較兩方經解，陳傅良先從春秋情勢的轉變切入，展開歷史解釋，在此之上建立一字褒貶，這和蘇轍等人多止於歷史解釋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換言之，《禮記．經解》稱：「屬辭比事，《春秋》教也。」[119]如果比事屬辭作為孔門解經之心法，[120]那麼陳傅良將《春秋》視為經書，先採比事之法，原始

114 宋．呂大圭，《春秋或問》，卷 7，《通志堂經解》第 23 冊，頁 13392。

115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5，《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154。

116 宋．蘇轍，《春秋集解》，卷 5，《叢書集成初編》第 3639 冊，頁 46。

117 黃震曰：「轅濤塗慮齊師歸自陳有供億也，誤之東歸，陷沛澤中，故怒其不忠而執之。」見宋．黃震，《黃氏日鈔》，卷 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7 冊，頁 165。

118 宋．呂大圭，《春秋或問》，卷 11，《通志堂經解》第 23 冊，頁 13429。

119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卷 48，頁 1254。

120 張高評提到：「《禮記．經解》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或孔門輾轉相傳之解經心法，而為漢儒得而著錄之者。連屬上下前後之辭文，排比相近相反之史事，統合數十年積漸之時勢，通觀全《經》二百四十二年之書法，可以破譯孔子《春秋》『都不說破』之『言外之意』。」見張高評，〈比屬觀義與宋元《春秋》詮釋學〉，上海交通大學經學文獻研究中心編，《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 15 輯（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察終，對春秋史事作出歷史敘述與解釋，展開一卷「諸侯無王」走向「諸侯無伯」的世變局勢圖，從歷史世變的角度抉發春秋時勢的變動。接續運以屬辭，探究聖人筆削，選擇將《春秋》世變分為三個階段，廓清經文書辭的異同，於達例之外推尋聖筆褒貶，假之以示《春秋》大義，相互濟用「比事─詳閱世變─史」、「屬辭─一字褒貶─經」，方法多重，指涉明確。

因此所謂的「經史交融、以史通經」必須先從史事切入，誠如孫旭紅所言，先將事理、事勢、世變當成理解經義的基礎，[121]畢竟孔子成經並非徒托空言，而是見之於「行事」，但歷史發生的記述只是背景，須將視角拉回到《春秋》經文，既然「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122]那麼所有的微言大義都寄託在字裡行間。劉敞（1019-1068）曰：「魯史所書有詳有略，仲尼止考核是非，加褒貶而已。」[123]聖經和魯史最大的差異就在「褒貶」，若要跳離魯史策書的體系就必須細研經文中的字例褒貶，最終通往《春秋》大義，[124]這才符合「經史交融、以史通經」的研究路徑。

當然我們直從史家筆法也可推敲《春秋》記事的幾項原則與精神，[125]但《春秋》經有其主體性、獨特性，有百代不易之法，具備垂教後世的經典意義，正如皮錫瑞在《經學通論》所言：「說《春秋》者，須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書，不是鈔錄一過，又須知孔子所作者，是為萬世作經，不是為一代作史，經史體例所以異者，史是據事直書，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是必借褒貶是非，以定制立法，為百王不易之常經。」[126]所以解經先以史事為基礎，參

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頁 83。

121 孫旭紅，《居今與志古：宋代《春秋》學研究》，頁 148。

122 漢．司馬遷，〈孔子世家〉，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卷 47，頁 1944。

123 宋．劉敞，《春秋權衡》，卷 8，《通志堂經解》第 19 冊，頁 11135。

124 褒貶只是一個媒介，研經的宗旨是體察《春秋》大義，如阮芝生所言：「《春秋》之有褒貶固矣，然《春秋》之有褒貶非以為褒貶也，《春秋》之有褒貶乃假以示法也。孔子作《春秋》立一王之法，將垂教萬世，此其根本目的，褒貶乃用以達此目的之手段，其本身非目的也。」見阮芝生著，趙林校訂，《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頁 184。

125 例如史家有「隱諱」之曲筆書法，魏了翁說：「舊史有所避諱，聖賢因而從之，以通人事之理，故容有掩惡之法。」見宋．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卷 13 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53 冊，頁 397。張高評亦曾討論歷代學者如何從類比史事考求聖經大義，可參看。見張高評，〈《春秋》書法與「義」在言外──比事見義與《春秋》學史研究〉，《文與哲》第 25 期（2014 年 12 月），頁 77-130。

126 清．皮錫瑞，〈論春秋是作不是鈔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為周公作凡例陸淳駁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史事終始之後再尋枝返本，統合字例褒貶，防止各安其意、準的無依，才可真正打通經、史的特性，連成一條相互啟發的渠道，而陳傅良《春秋後傳》先後並用「比事—詳閱世變—史」、「屬辭—一字褒貶—經」，明顯較蘇轍、朱熹、呂大圭、黃震、呂祖謙等人更能落實這套研究方法。[127]

四、陳傅良《春秋後傳》的學術定位

宋人南渡之際，胡安國《春秋傳》於紹興初期奉高宗詔令，纂修《春秋傳》十餘萬言，宋高宗肯定是書，謂其深得聖人之旨。[128]胡安國主張《春秋》有正例、變例，必須由例解經，循一字褒貶昭顯聖筆微旨，[129]陳傅良與胡安國一樣，將魯《春秋》視為「史」，而孔子《春秋》則為「經」，從「史」到「經」除了具有「實錄」舊文，也有聖人「特筆」的變文，寓有一字褒貶，「貶不於事端則必於其重者」，[130]陳、胡二人都是透過經文中的存削因革與字句損益作為解經路徑。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

甚明〉，《經學通論》，卷 4，頁 2。

127 所以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認為：「陳氏的這種治經方法，應該說，也還是具有一點本期《春秋》學『事義匯通、經史交融』的時代特色。」但實際上陳傅良的方法才是最鮮明強烈的，至於呂祖謙的《左傳》研究是純粹史學取向，從《左傳》品評人事，借古鑑今，和他其它的史學著作如《大事紀》、《歷代制度詳說》都有鮮明的致用色彩。四庫館臣就評價《大事紀》：「議論正大，於古今興衰治忽之理，尤多所發明。」元儒彭飛〈歷代制度詳說原序〉讚許《歷代制度詳說》：「於古今沿革之制，世道通變之宜，貫穿折衷，首尾備見，鑿鑿如桑麻穀粟切于民生實用有不容闕者焉。」因此不適合將呂祖謙歸為「經史交融」一派。以上分見：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頁 52-65。宋．呂祖謙，《大事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24 冊，頁 2。宋．呂祖謙，《歷代制度詳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23 冊，頁 895。

128 元．脫脫等，〈儒林傳〉，《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卷 435，頁 12914。

129 胡安國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見宋．胡安國著，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頁 11。

130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4，《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1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131]從孟子載錄孔子之語後，各家試圖鉤稽魯《春秋》到孔子《春秋》的筆削變化，從不同路徑旁推曲暨，建構聖人大義。北宋程頤也曾說到：「《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132]胡《傳》〈述綱領〉首引孟子論《春秋》之語，並在〈述綱領〉表示《春秋傳》「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為證云」，[133]承襲孟子、程頤之說，積極尋繹《春秋》大義：尊君、討賊、復仇、攘夷等內容，將此落實於國家政治，改善社會弊端，具備強烈的經世思想。

雖然陳傅良也以一字褒貶為主要的解經路徑，但他沒有選擇胡安國這條學術模式，無意多方創構《春秋》大義。陳傅良《後傳》曰：「《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134]觀點並不新穎特立，歷代《春秋》經傳的著作中都可找到相同說解。不過此處必須說明，雖然陳傅良和胡安國的學術模式不同，但他們都注意到三綱倫常的精神在春秋時期漸趨消融與瓦解，因此藉《春秋》大力疾呼三綱之道的重要。

胡安國於《春秋》隱公元年舉出「正人心」，沿襲《禮記．禮運》：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和夫婦等綱常倫理，寄寓「天下為公」，並於紹興二年（1132）向朝廷上奏〈時政論〉：「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綱正則基於治而興，三綱淪則習於亂而亡。」[135]夫婦、父子、君臣、兄弟、長幼等綱常是國家軍政的基礎，箇中的從屬關係必須有尊卑秩序，才不會危害廟社宸宇，《春秋傳》中多次可看到胡安國強調三綱為軍政之本的經解。[136]

陳傅良也談到正人心：「孟子以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誅亂臣賊子，凡以正人心也。聖賢事業，以人心為本。」[137]認為「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

131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卷 8 上，《十三經注疏》第 8 冊，頁 146。

132 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文集》，《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8，頁 583。

133 宋．胡安國著，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頁 14。

134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9，《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193。

135 宋．胡安國著，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頁 595。

136 例如《春秋》桓公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胡安國曰：「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見宋．胡安國著，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卷 5，頁 57。

137 宋．陳傅良，〈赴桂陽軍擬奏事箚子〉，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19，頁 2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8]強調「《春秋》一書固拳拳為制度紀綱作也」。[139]他尤其關注君臣之道，慨歎：「嗚呼！《春秋》作，君臣之道衰矣。聖人所以維君臣之道者，亦至是焉始窮，故《春秋》終焉。」[140]批評當時學者「不知六經之作相次，以立君臣之道，而曰徒文而已。」[141]止齋於紹熙三年（1192）向光宗進獻《周禮說》一書，試圖警惕惡性膨脹的皇權、相權，[142]界定書中以冢宰為首的職官體系。又認為研究《周禮》應考校古今，將先秦兩漢以來的官制和當朝相比，「須知尊卑、貴賤、緊慢、親疏不同」，[143]六官體系有其系統，「道揆在上，權綱歸一，而無專遂之私；法守在下，眾職交修，而無詭隨之患。所謂周道如砥者以此。」[144]如果《周禮》是制度面的理論，那麼《春秋》中君道從「無王」到「無伯」的興衰沿革則是事例的最佳印證：一旦三綱隳壞、君道淪喪，最終會走入夷狄爭勢的局面。

紹熙二年（1191），陳傅良弟子曹叔遠（1159-1234）向朱熹問學，[145]曹叔遠述及他跟隨陳傅良的治學過程，當中講到：「讀《春秋》，便理會所以待伯者予奪之義。」[146]而褒貶與奪的判斷標準正和尊王有關，所以當齊桓公主持首止、葵丘之盟，陳、胡兩人都從三綱的角度褒揚齊桓尊周。《春秋》僖公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胡安國認同齊桓公的表現：

>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

138 宋．陳傅良，〈經筵孟子講義〉，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28，頁 372。

139 宋．陳傅良，〈唐制度紀綱如何論〉，宋．方逢辰批點，《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卷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0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頁 7。

140 宋．不著編人，《十先生奧論註》，後集，卷 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2 冊，頁 148。

141 同上註。

142 王宇，《道行天地：南宋浙東學派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 352。

143 宋．王與之，〈弁言〉，《周禮訂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3 冊，頁 10。

144 宋．王與之，《周禮訂義》，卷 4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3 冊，頁 735。

145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卷下，頁 1204。

146 宋．朱熹，〈朱子十七．訓門人八〉，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0，《朱子全書》第 18 冊，頁 37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147]

尊奉王嗣安定國家之本，率領諸侯扶翼世子，首止之盟彰顯父子之倫與君臣之義，發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精神，所以經文於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葵丘，稱美齊桓。[148]陳傅良也與胡安國論點相合：

> 天子之三公也，桓嘗殊會王世子，則其不殊會三公何？《春秋》是以予桓也。《春秋》之予桓奈何？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149]

經文不以「殊會」書之是肯定齊桓尊周，陳傅良以「知節」高度評價齊桓之行，如同《春秋》僖公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後傳》亦曰：「諸侯何以會王世子？定世子也。於是子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桓公率天下之諸侯以會之，世子危不得立而為會以定之，禮之變者也。」[150]讚許齊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閒矣」、[151]「於是知節矣」，[152]落實三綱倫常的精神。

歐陽修（1007-1072）曾對五代政治的動盪深有感觸：「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

147 宋．胡安國著，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卷 11，頁 155。

148 胡安國曰：「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見宋．胡安國著，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卷 11，頁 159-160。

149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5，《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156。

150 同上註，頁 12155。

151 同上註。

152 同上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3]倫理價值牽繫著國家秩序，胡安國身逢靖康之禍，深刻反思整個宋朝因為綱紀不正，連帶影響政治、經濟、軍事、國防、外交，最後發生金寇重兵侵凌中原的慘禍，所以透過《春秋》重振三綱之道，恢復國家秩序。陳傅良也有強烈的愛國情操，多次透過詩作表達己志：「王事何時暇，神州半陸沉」、[154]「中原五十載，胡騎亂禹迹」、[155]「東都今何如，胡馬鳴蒿蓬」，[156]亦於〈經筵孟子講義〉發義：「今敵國之為患大矣，播遷我祖宗，丘墟我陵廟，羶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甚於此者也。」[157]對朝廷抗金復國仍有期許。但他也提醒：「外有夷狄之難，內有盜賊之患」、[158]「方今之患，何但夷狄」，[159]若要妥善處理國家內外交迫的危機，唯有先端正綱紀，「君道得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160]一旦三綱失去秩序，就會間接失去兵權，[161]導致春秋時期從無王到無伯的升降關鍵就是三綱離轍。

既然陳、胡解經皆注意三綱之道，那為何陳傅良晚年作《春秋後傳》選擇將「三綱」融貫於「世變」之遷流？主要原因正與程朱理學將「理欲」套用在「三綱」的學術特色有關。北宋程頤曰：「人倫者，天理也。」[162]並明言：「父

153 宋．歐陽修，〈唐廢帝家人傳〉，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76），卷 16，頁 173。

154 宋．陳傅良，〈和陳仲石韻〉，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5，頁 62。

155 宋．陳傅良，〈除夕用前韻〉，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1，頁 7。

156 宋．陳傅良，〈遊鼓山〉，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1，頁 4。

157 宋．陳傅良，〈經筵孟子講義〉，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28，頁 374。

158 宋．陳傅良，〈赴桂陽軍擬奏事箚子〉，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19，頁 271。

159 宋．陳傅良，〈吏部員外郎初對箚子〉，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20，頁 284。

160 宋．陳傅良，〈轉對箚子〉，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20，頁 287。

161 《春秋》僖公十七年：「夏，滅項」即是印證，《後傳》曰：「書滅項，失兵權之漸也。……春秋之季，大夫不稟命於諸侯非但魯也，鄭伯會于夷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蔡侯會于召陵，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謹而志之也。」《公》、《穀》謂齊桓滅項，但《左傳》以魯僖公在齊，魯國滅項並非公命，陳傅良引申大夫不尊魯公而擅自出兵，諸侯漸失兵權正與君臣倫理悖反有關。見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 5，《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158。

162 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外書》，《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7，頁 3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163]道心天理與三綱五倫密切相近，而《春秋》中有許多悖反名分、亂倫失理之事，程頤有意作書發明，將「天理」、「人欲」融于《春秋》，弟子謝湜也有相同論述，[164]至胡安國《春秋傳》則具體開展更多內容，將「理欲」作為治經門徑，連結到「三綱」之上，形成一套堅固完整的價值體系。[165]這對南宋《春秋》學的影響極大，許多學者都以此方式解經，例如葉夢得（1077-1148）就認為聖人「即魯史而為之經，求之天理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在也。」[166]並將「理欲」直接結合《春秋》。[167]朱熹雖未從《春秋》麟經發明「理欲」，但同樣指出「天理」和「三綱」的關係：「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168]又言：「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

163 同上註，卷 5，頁 77。

164 謝湜曰：「夫欲天理明、人倫正、紀綱立，偽不汩真、邪不害正，捨《春秋》何以哉？」見宋．李明復，〈春秋集義綱領〉，《春秋集義》，卷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55 冊，頁 187。

165 王立新說：「胡安國認為『三綱』之道的大源根於天，它以人的本性為根據和支持，因此牢不可破。」康凱淋亦提到：「胡氏為了端正人心，一再聲明『存三綱』的重要，將形下『三綱』扣緊形上『天理』，表達人事易變，但天理恆存，人們應隨天理而行，肆人欲就會亂人倫，亂人倫即是滅天理。……『天理人欲』是他援用的門徑要領，具體主張就是建立夫婦、父子、君臣等人倫關係，以確定個體群體之名分，藉此維持社會秩序。」見王立新，《開創時期的湖湘學派》（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3），頁 105-112。康凱淋，《胡安國《春秋傳》研究》（臺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4），頁 340。

166 宋．葉夢得，〈石林先生春秋傳序〉，《葉氏春秋傳》，《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1917。

167 張浚（1097-1164）亦云：「一言以斷《春秋》之義，曰天理而已矣。」李明復（1174-1234）曰：「夫《春秋》即天理也。」朱熹後學也都有此說解，例如呂大圭認為《春秋》是「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真德秀（1178-1235）也以《春秋》「章明天理，遏止人欲。」以上資料分見宋．張浚，〈論春秋〉，傅增湘纂輯，《宋代蜀文輯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4），卷 45，頁 591。宋．李明復，〈進春秋集義表〉，《春秋集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55 冊，頁 179。宋．葉夢得，《葉氏春秋傳》，卷 20，《通志堂經解》第 21 冊，頁 12120。宋．呂大圭，《春秋五論》，《通志堂經解》第 23 冊，頁 13498。

168 宋．朱熹，〈讀大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0，《朱子全書》第 16 冊，頁 33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9]既推崇天理的高度與普遍性，又將三綱統攝於天理的範疇，這類講法可說是南宋學術的重要主張。[170]

而在南宋《春秋》學史的脈絡中，紹興二年（1132）八月，宋高宗命胡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紹興五年（1135）四月，上詔令胡安國纂修《春秋傳》，隔年十二月《春秋傳》書成，凡十餘萬言，卷首引孟子、莊子、董仲舒、王通、邵雍、張載、程頤等七家論《春秋》的觀點。橫浦先生張九成（1092-1159）早年從楊時學，亦提到：「嗚呼！天下不可一日無王道也久矣，天下一日而無王道，是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吾夫子憫人欲之四起，悼天理之將滅，所以因魯史而作《春秋》，蓋將以續三王之道而扶天理於將亡也。」[171]並在紹興八年（1138）於經筵進講《春秋》。[172]李明復《春秋集義》蒐集周敦頤、程頤、張載、胡安國等人的經解，也獲得宋寧宗的支持，可見當時獲得官方認同而掌握學術發言權的是胡安國等人，援用「天理」、「人欲」解經的程門之學正是南宋《春秋》學的主流。

清代四庫館臣評價：「傅良之學終以通知成敗，諳練掌故為長，不專於坐談心性。」[173]心性之學闡釋「道」的法則或規律，偏向形上論述，陳傅良反對不切實際的抽象道理，他曾向孝宗上奏：「腐儒空談，祇亂人聽。」[174]主張道器合一，禮樂法度才是真正的道理。[175]他繼承薛季宣「無為空言，無戾於行」[176]

169 宋．朱熹，〈答吳斗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59，《朱子全書》第 23 冊，頁 2837。

170 魏義霞說：「無論是吾心、天理還是良知都是忠孝仁義代表的三綱五常。儘管具體方式有別，奉天理為宇宙本體、進而把三綱五常神化為天理是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的共同做法。」見魏義霞，《理學與啟蒙：宋元明清道德哲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 158。

171 宋．張九成，〈春秋講義〉，宋．郎曄編，《橫浦集》，卷 1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8 冊，頁 389。

172 尹波編，《張九成年譜》，《宋人年譜叢刊》第 8 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頁 4905。

173 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59，頁 2129。

174 宋．陳傅良，〈壬辰廷對〉，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29，頁 384。

175 曹器遠向朱熹回答自身所學來歷，提到其師陳傅良「論身己上工夫，說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便有道，不是兩樣，須是識禮樂法度皆是道理。』」見宋．朱熹，〈朱子十七．訓門人八〉，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0，《朱子全書》第 18 冊，頁 3785。

176 宋．薛季宣，〈答象先姪書〉，宋．薛旦編，《浪語集》，卷 25，《景印文淵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治學精神，關注現實事務的發展。蒙文通說：「陳君舉最為知今，但他言今必自古。」[177]斟酌古今的方法是從薛季宣而來，[178]並以「綜理當世之務」[179]為目標，「於井地、軍賦尤為專門之學，宜其精究治本，非空譚經世者比也。」[180]陳傅良也多次在著作中敘述治學觀點，例如〈策問十四首其一〉提到：「以時務發策，以求實學。」[181]於〈大理寺主簿王寧新知信陽軍〉也說道：「所貴於儒者，謂其能通世務，以其所學見之事功。」[182]相關研究都落實在具體人事之上，「知古人之治可措於今人之治」，[183]因此對三代秦漢以降的歷史制度別有掌握，皆本於實用之文，一事一物皆以「稽實」、「篤實」為長，[184]如黃宗羲於《宋元學案》「艮齋學案」案語所言：「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矇瞳精神，自附道學者，于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為何等也。」[185]他們講求「通世務」、「重事功」、「切時務」的宗旨，與程朱理學的治學方法與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建構理氣心性的內蘊並不是他們的學術課題，當然不會認同當代以「三綱」為「天理」的語境。

因此，在這類學術氛圍下，陳傅良既身為永嘉學派的重要學者，他對學風的不滿必會作出回應。《浙江文化史》認為：

四庫全書》第 1159 冊，頁 395。

177 蒙文通，〈治學雜語〉，蒙默編，《蒙文通學記》，頁 6。

178 薛季宣曾言：「古之所以貽今，今之所以觀古者，惟憑史籍。」樓鑰曾評論薛氏的學術特色：「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見宋．薛季宣，〈策問〉，宋．薛旦編，《浪語集》，卷 28，《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9 冊，頁 438。宋．樓鑰，〈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攻媿集》，卷 95，《叢書集成初編》第 2019 冊，頁 1323。

179 宋．樓鑰，〈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攻媿集》，卷 95，《叢書集成初編》第 2019 冊，頁 1323。

180 清．孫詒讓著，潘猛補點校，《溫州經籍志》，卷 3，頁 123。

181 宋．陳傅良，〈策問十四首〉之一，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43，頁 542。

182 宋．陳傅良，〈大理寺主簿王寧新知信陽軍劉崇之並除太府寺丞〉，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14，頁 190。

183 宋．葉適，〈溫州新修學記〉，《水心文集》，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卷 10，頁 178。

184 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59，頁 2129。

185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52，頁 16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他竭力反對無裨于實際事業之開闢的道德性命之清談，而主張學術須以現實事功的切實轉換為根本目的，強調『王者之學，經世為重』，並以力挽當時學風之偏弊為己任。[186]

晚年之所以疾病纏身仍堅持註解麟經，莫過於不願依循學術主調發聲，有意改造程朱理學眼中的《春秋》。於是選擇春秋的歷史人事作為具體依託，[187]在形上「理欲」的主流之外，高舉形下「世變」的旗幟，重新將《春秋》圈入到當時的學術脈絡，也藉此矯正已和日常人事脫軌，漸已淪於「虛誕」、「空無」、「空虛」的程門後學。[188]而《後傳》中的《春秋》「世變」並非是單純的歷史敘述與解釋，不能與朱子學派的觀點等而視之，最大的差異就是陳傅良認同一字褒貶，擇取「經史會通」的解經方法，試著把春秋世變結合一字褒貶。正如戴維所說的，他已自成《春秋》學上一個派系，[189]在南宋學術中也另發展為一股潛流、副調，不斷地與當時的主流對話，並積極想取代對方，躍升為時代舞台的主聲。[190]

---

186 沈善洪主編，《浙江文化史》上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頁 116。

187 陳寅恪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見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辭并序〉，《寒柳堂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頁 6。

188 淳熙年間，程門後學的學風受到時人抨擊，謝廓然就於淳熙五年（1178）三月向孝宗上奏，直指當時：「主程氏之說則務為虛誕，夫虛誕之說行則日入于險怪。」而呂祖謙雖肯定二程與張載等人，但也批評程子後學「門人高弟既盡，晚出者或騖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曹叔遠亦隨陳傅良治學以後，重新省視程頤之學有流於空虛的弊病：「少時好讀伊洛諸書，後來見陳先生，卻說只就事上理會，較着實。若只管去理會道理，少間恐流于空虛。」以上引文分見元．不著撰人，《宋史全文》，卷 26 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31 冊，頁 421。宋．呂祖謙，〈薛常州墓誌銘〉，黃靈庚、吳戰壘主編，《東萊呂太史文集》，卷 10，《呂祖謙全集》第 1 冊，頁 166。宋．朱熹，〈朱子十七．訓門人八〉，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0，《朱子全書》第 18 冊，頁 3785。

189 戴維，《春秋學史》，頁 381。

190 王汎森曾提出「執拗的低音」，並說：「歷史是由很多股力量競爭或競合前進的，一個時期並非只有一個調子，而是像一首交響曲，有很多調子同時在前行。」時代會有主調、副調、潛流等彼此交互影響，當時不受注意的「低音」也許一直在跟主流對話。見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4），頁 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結語

歷代學者各闢蹊徑，試圖揭開麟經隱微的面紗，彰顯尼父之心與《春秋》大義，但「授受雖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191]或因師法家學、政治環境、學術風氣、學侶門派等因素，使得《春秋》經說越趨鱗雜，蔓衍更多片語，導致學術轉益紛爭。不過正如李綱在〈書襄陵春秋集傳後〉評《春秋》所言：「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諸夏，外夷狄，志天道，謹人事而已。」[192]《春秋》仍不脫離秩序維護與價值判斷的精神。

從經學史的發展來看，陳傅良《春秋後傳》解經以歷史敘述和解釋為基礎，恢廓一幅春秋世變圖，劃分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三階段，勾勒「諸侯無王」走向「諸侯無伯」的演變局勢。在此之上又結合經文筆法，體現一字褒貶的變異，藉由「世變」統合春秋史事與《春秋》經文，落實經史交融的研究方法。若對應學界觀點，戴維已點出止齋特色，陳傅良使用的推尋方法確實較前人為勝，因為褒貶義例之所以受人詬病就在於拋棄史事，「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遺一事之義」，[193]單憑經文作為例法的材料實不符合孔子成經之法。因此在言論依胸臆為斷的狀況下，多流於支離穿鑿；或將所有經文盡納於褒貶框架，失之苛刻，但陳傅良與此類學者的研究路徑完全不同。相較之下，趙伯雄謂止齋反對以例、變例解經的說法尚須斟酌。

從學術史的脈絡而言，陳傅良身為永嘉學派的領袖，他所說的「世變」乃是永嘉的治學宗旨，是落實在現實的歷史制度，以具體事功為通變之導向，所以將「三綱」融貫於「世變」，明顯別於程朱學派選擇將「理欲」套用至「三綱」的主張。南宋時期，「伊洛之學行於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194]程朱理學活躍於南宋孝宗朝，永嘉學人也試圖躋身學林的主流地位。雖然兩方治學門路大相逕庭，但其實都圍繞在三綱秩序，以經世致用為目的，針對當朝國政提出實際改革。《莊子・天下》篇說：「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195]「世變」與「理欲」看似相對，實際上雙方觀點各有所長，縱使體系架構不一，但學術綱領可謂殊途而同歸。

191 清・章學誠，〈浙東學術〉，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頁 122。

192 宋・李綱，〈書襄陵春秋集傳後〉，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下冊（長沙：岳麓書社，2004），卷 163，頁 1497。

193 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序〉，《春秋本義》，《通志堂經解》第 25 冊，頁 13956。

194 宋・周密，〈道學〉，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11，頁 202。

195 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7），卷 10 下，頁 10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3。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第8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7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第1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第6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7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

宋・劉敞，《春秋權衡》，《通志堂經解》第19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宋・歐陽修著，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臺北：鼎文書局，1976。

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宋・蘇轍，《春秋集解》，《叢書集成初編》第363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通志堂經解》第21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著，宋・方逢辰批點，《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著，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

宋・胡安國著，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宋・王與之，《周禮訂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3冊，臺北：臺灣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務印書館，1986。

宋・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叢書集成初編》第32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宋・薛季宣著，宋・薛旦編，《浪語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宋・李綱著，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04。

宋・葉夢得，《葉氏春秋傳》，《通志堂經解》第21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宋・張九成著，宋・郎曄編，《橫浦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3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宋・李明復，《春秋集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宋・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宋・呂祖謙著，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宋・呂祖謙，《大事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2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歷代制度詳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2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宋・樓鑰，《攻媿集》，《叢書集成初編》第2003-202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宋・周密著，張茂鵬點校，《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

宋・李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通志堂經解》第22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宋・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

宋・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宋・呂大圭，《春秋五論》，《通志堂經解》第23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春秋或問》，《通志堂經解》第23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宋・黃震，《黃氏日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宋・不著編人，《十先生奧論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元・脫脫等，《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

元・黃溍，《黃文獻公集》，《叢書集成初編》第208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元・趙汸，《春秋集傳》，《通志堂經解》第25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元・趙汸，《春秋左氏傳補注》，《通志堂經解》第26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元・不著撰人，《宋史全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3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元・劉塤，《隱居通議》，《叢書集成初編》第21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元・程端學，《春秋本義》，《通志堂經解》第25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明・王禕，《王忠文公集》，《叢書集成初編》第242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孫詒讓著，潘猛補點校，《溫州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2011。

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王鳴盛著，黃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

清・孫葆田，《宋陳文節公傅良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清・蘇輿著，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

清・孔廣森著，崔冠華校點，《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90。

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7。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二、近人論著

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4。

王宇，《道行天地：南宋浙東學派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王立新，《開創時期的湖湘學派》，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3。

尹波編，《張九成年譜》，《宋人年譜叢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2005。

阮芝生著，趙林校訂，《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沈善洪主編，《浙江文化史》，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

林時民，〈「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傳統〉，《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4期，2005年12月，頁35-58。

張高評，〈《春秋》書法與「義」在言外——比事見義與《春秋》學史研究〉，《文與哲》第25期，2014年12月，頁77-130。

———，〈比屬觀義與宋元《春秋》詮釋學〉，上海交通大學經學文獻研究中心編，《經學文獻研究集刊》第15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頁81-114。

康凱淋，《胡安國《春秋傳》研究》，臺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4。

陳寅恪，《寒柳堂集》，臺北：里仁書局，1980。

孫旭紅，《居今與志古：宋代《春秋》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傅增湘纂輯，《宋代蜀文輯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4。

蒙文通著，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戴維，《春秋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魏義霞，《理學與啟蒙：宋元明清道德哲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en Fuliang'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s in his *Chunqiu Houzhuan*

Kang, Kai-li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Chunqiu Houzhuan* (Later Commentary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ritten by Chen Fuliang (1137-1203)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investigates the way of interpreting the Classics in this book under the contex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lassics and academic history. Chen Fuliang followed the research mode that Lu Zuqian (1137-1181) had used to interpret *Zuo Zhuan* (Commentary of Zuo), and further developed the research guidelines "Penetration of Worldly Changes" from Yongjia School so as to make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e regarded the guidelines as criteria to clarify *Chunqiu*'s textual differences and sought the true meanings in its praise and criticism. This not only extended the tradition of interpreting the Classics in the *Gongyang Zhuan* (Commentary of Gongyang) learning in the Han Dynasty, but also embodied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Yongjia School both in studying the Classics and history. Comparing with such scholars as Su Che (1039-1112), Zhu Xi (1130-1200), Lu Dagui (1227-1275), and Huang Zhen (1213-1281), Chen had better methodology in integrating the studies of Classics into historical research. Such integration was motivated by hi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post-Cheng Neo-Confucianism scholars who attached the metaphysical idea of "heavenly principles vs. human desires" to *Chunqiu*. He therefore decided to take the physical idea of "changes in the world" in understanding *Chunqiu*. As such, his ideas became the academic mainstream and thus raised his reputation in academia in terms of adjusting Cheng Sect's absurd and nihilistic learning climate to concrete historical descriptions and happenings.

Keywords: Chen Fuliang, *Chunqiu*, *Zuo Zhuan*, Yongjia

*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Email: 095666@mail.fj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